



大会

Provisional

For participants only

3 Jul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

第 3408 次(闭门)会议临时简要记录

2018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目录

纪念委员会成立七十周年(续)

与第六委员会的对话

第一小组讨论：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结构性挑战

第二小组讨论：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对以往和未来互动的反思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一份备忘录内，以一种工作语文提出，并反映在记录文本上。更正请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08129 (C)



请回收



出席：

主席：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委员： 阿圭略·戈麦斯先生
奥雷斯库先生
西塞先生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加尔旺·特莱斯女士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格罗斯曼·吉洛夫先生
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
黄先生
贾洛先生
莱赫托女士
村濑先生
墨菲先生
阮先生
诺尔特先生
奥拉尔女士
瓦扎尼·恰迪先生
朴先生
彼得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
拉吉普特先生
赖尼希先生
鲁达·桑托拉里亚先生
萨博亚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
特拉迪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瓦科先生
迈克尔·伍德爵士
扎加诺夫先生

秘书处：

卢埃林先生 委员会秘书

下午 3 时 05 分会议开始。

纪念委员会成立七十周年(续)

与第六委员会的对话

瓦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共同主席)以国际法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言,他向与会者表示欢迎并说,值此纪念委员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由委员会委员与大会第六委员会代表之间开展对话,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特征十分妥帖。这一对话将通过两次先后开展的小组讨论进行,这些讨论将在介绍性发言之后立即开始。

国际法委员会自 1949 年首届会议以来,每年都向大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向大会通报委员会在其年度会议上开展的工作。第六委员会对本委员会报告的审议采取实质性辩论的形式,吸引了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以及联合国会员国外交部的参加,其中许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辩论和大会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明确显示了本委员会作为一个专家机构与会员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上级机构之间保持的密切关系。

这种关系在国际法委员会《章程》中得到确认,并且是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核心,为其工作赋予了独特的性质,在此过程中,会员国有机会对本委员会的成果发表评论。每年会员国都有机会讨论本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各个章节或整个年度报告,无论是在第六委员会上口头提出,还是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可提供评论和意见,还可以就报告第三章向各国提出的具体问题提供国家实践方面的证据。一旦委员会完成某一专题的一读,它再次敦请各国就案文提出评论和意见,委员会在二读审议该专题时将考虑到这些内容。正如委员会几位前任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委员会工作的成功来源于实践,同样取决于与第六委员会的持续对话,也取决于各国政府以书面评论和意见的形式提供的合作,包括关于国家实践方面的信息。这些投入对委员会履行其职能极具价值,它们确保委员会的工作不仅仅基于理论公式。希望本次会议的对话能够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当涉及委员会的最终草案时,这种关系的表达尤其具有深远意义。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委员会《章程》第 20 条规定只以条款的形式编写草案。然而,委员会越来越

多地就“原则”、“结论”、“准则”、“示范条款”或研究小组或工作组“最后报告”的形式开展并完成草案的起草工作。这些是委员会议程上若干专题的最终产品形式,包括本届会议一读或二读通过的四个专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千年开始到 2014 年,委员会对提交大会的所有最后条款草案的建议是,由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注意到条款草案,并在附件中转载其案文,仅在稍后阶段,考虑是否有可能根据有关草案拟订一项公约。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八届会议上又重返其 2000 年以前的做法,直接向大会建议,根据其关于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的条款草案拟订一项公约。

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委员会背离其先前的做法,试图顺应大会公开且日益渐多地表明不情愿根据委员会的最后草案拟定国际公约的态度。这种态度清楚地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即自 2004 年以来,大会没有基于委员会提交的最后草案通过或在其主持下通过任何的公约。在过去 20 年中,委员会就各类专题向大会提交了九份最后草案,所有这些草案均旨在为国际公约奠定基础。

大会就本身而言作出的反应仅限于借助定期通过的决议——通常每三年一次——落实委员会的建议性措词,却一再拖延(最近的一个例子为无限期拖延)审议委员会关于将其最终草案转化为一项国际公约的建议。这种状况令人遗憾,需要大会通过第六委员会迅速采取有效补救行动。

加福尔先生(共同主席)以第六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言说,第六委员会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机共生关系。第六委员会发挥了若干重要作用,他想强调其中的三个作用。首先,它作为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履行传统角色,即作为决策者讨论法律问题的论坛。它的决策作用体现在最终通过的决议中,这些决议是经过认真、审慎和广泛的协商和谈判的结果,包含有本委员会代表与各国首都法律顾问之间的大量互动。

对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的讨论更是如此,该报告体现了六委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这两个机构之间的互动是委员会在大会年会期间举行的“国际法周”的一个独到之处。针对委员会报告的辩论和谈判旨在为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事项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导和决定。

六委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一个谈判论坛。多年来，六委通过其工作组和附属机构完成了若干重要文书，包括根据委员会工作产生的草案。实际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就是六委全体工作组根据委员会编写的条款草案谈判而成的。六委上一次提议召开的外交会议——作为缔结和通过这类文书的传统论坛——是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联合国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而案文正是由委员会编写的，并根据六委的建议在特设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

六委的第三个作用是构建共识。例如，通过非正式磋商，六委推动了讨论，促使通过了一项普遍接受的决定，涉及外交信使和没有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条款草案。六委继续利用工作组和非正式磋商等方式帮助就特定问题达成共识。

过去 15 年来，委员会向六委提交了八个已完成的项目，这些项目仍然处于六委讨论的不同阶段。六委面临的任务是圆满完成这些讨论和文件。为此，六委必须探究和处理法律、政策和其他考虑因素，以便形成共识和达成政治协议。这并非是一件易事，但通过在六委范围内的集体合作，并继续作为构建共识和寻求政治协议的平台，六委可以为其面临的一些最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做出重要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六委内部具有卓著的专业水准和共事氛围，在所有成员中普遍持有积极合作的精神，这些品质是六委的一项重要资产，它与委员会通力合作，帮助就国际法的重要问题建立共识。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共同主席)说，会议的余下部分将在小组讨论范围内进行。两个规划的小组讨论的第一个将侧重于委员会和六委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由他负责主持；第二个小组讨论将反思这两个机构目前和今后的相动作用，由加福尔先生主持。每个小组有四名小组成员，其中一名为来自某一会员国首都的法律顾问，一名来自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另外两名为委员会委员。小组成员发言后，开始自由发言进行互动式讨论。

第一小组讨论：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结构性挑战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共同主席)以主持人身份发言说，小组成员将讨论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存在的结构性挑战。就其本身而言，他更愿意通过参考委员会《章程》中众所周知和相关的规定来为讨论定下基调。然而，在这样做之前，值得回顾的是《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章程》第 1 条在描述大会和委员会各自和相辅相成的任务时提到了编纂之前的逐步发展。大会 1946 年 12 月 11 日第 94(1)号决议的标题也是如此，大会通过该决议设立了一个由 17 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并指示它研究“大会应该鼓励逐步发展国际法及其最终编纂的方法”。正是根据国际法及其编纂委员会即“十七国委员会”的建议，成立了国际法委员会。

委员会《章程》第 15 条界定了第 1 条确定的委员会的两项主要任务。它规定“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一词意指，为了利便起见，就国际尚未订立规章或各国惯例尚未充分发展成法律的各项主题，拟订公约草案。同样，它规定“国际法的编纂”一语，为使用方便计，意指：更精确地制订并系统整理广泛存在国家惯例、判例和学说的国际法规则。

委员会履行每项任务的不同阶段由《章程》第 16 和第 17 条以及第 18 至 23 条中作了描述。然而，委员会早期采取的立场是，对这两个概念作出法定区别行不通，因此将它们合二为一并遵循单一的统合程序。委员会一再将其关于某一专题的工作成果描述为逐步发展和编纂，并认为将其临时通过的每项条款草案标为体现一个或另一个概念不切实际。尽管如此，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五年期中，曾反对这种既定惯例。他们认为，委员会最好应提醒各国注意，特别是当委员会的最终产品是一套条款草案时，明确指出它认为哪些具体条款构成逐步发展。

阿拉布伦先生(法国)作为小组成员说，法国特别重视委员会作为肩负编纂和发展国际法这一重要使命的机构。遵守国际法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也是法国国家法律制度的关键要素。事实上，正是在委员会第一位法国委员塞莱斯先生的鼓动下，1946 年的《法国宪法》体现了宪法一元论制度。这一

点说明了为什么法国十分珍视与委员会的关系，并自它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其工作。

毫无疑问，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的关系是委员会成功的决定因素。尽管如此，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时包括怀疑委员会保持其现有形式是否可取。他首先审视一下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关系的发展。然后，他再谈谈委员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最后，提出一些关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想法。

关于上述关系的发展，他说，委员会与会员国有密切的组织关系，这可以追溯到 1947 年 11 月 17 日大会第 174 号决议，该决议规定成立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会由大会从各国政府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的成员组成。一些委员会委员以前曾在第六委员会中代表其政府，而其他委员以往曾在各自政府任职期间履行或仍在履行官方职能，同时在委员会中任职。

各国有机会在委员会工作的不同阶段发表意见。它们可以提出供委员会审议的专题，尽管它们并不经常这样做，它们也可以表明对特定专题的优先考虑。此外，它们提供有益于委员会项目的数据和资料；它们每年都收到委员会的报告，并有机会在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期间对报告发表评论；它们对委员会的最终产品将采取何种行动有最终的决定权；当委员会的最终产品是公约草案时，它们参与多边公约的谈判，并签署或批准这类公约。

委员会最终产品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会员国的期望，而不论产品代表的是国际法的编纂还是逐步发展。这是委员会编纂任务所固有的，该任务要求它对各国的实践和意见进行详细审查。编纂工作还需要收集有关该专题的信息，以便确定一种综合表述方式，尽可能和谐地反映各国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实践。由于全世界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别报告员的努力。

考虑到各国的期望对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也非常重要。在这一进程中，各国政府提供的数据、资料和表达的愿望，以及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代表的对话是协助大会确定对委员会完成的文本采取何种行动的关键因素，无论它意味着不采取行动，注意到案文，还是将它作为谈判和缔结公

约的基础。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的高质量关系使委员会能够在过去为缔结重要国际公约做出贡献。

委员会近年来取得的成果较少，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若干因素这种关系遇到了挑战。第一个因素涉及为各国提供的使其有效及时了解并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手段有限。为了成功跟踪第六委员会关于委员会年度报告辩论的进展，各国需要调动大量资源，包括确保一至两名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所需的人力资源，以及为准备这些会议所需要的广泛研究。各国还必须就委员会每年在其年度报告第三章中要求提供资料的各种专题向委员会转达有关意见。然而，委员会处理的专题数量越来越多，明显给各国和委员会本身就这些专题进行深入审议的能力带来挑战。

第二个因素涉及委员会可用的手段有限，难以掌握和考虑到各国的实践、文化和意见的多样性。委员会面临的危险是，它可能会将其工作基础缩小到包含极少数世界观、文化或语言，甚至只包含一个。因此，需要做出特别努力，以确保特别报告员收到尽可能多的法律制度的发展情况。

第三个因素涉及委员会审议的大量专题，包括本届会议的 9 个专题和第六十九届会议的 11 个专题。显然，项目和专题数量的增加不利于深入审议每个专题，并可能妨碍委员会工作的进展。

除了专题数量外，专题的内容可能会引起疑虑，鉴于委员会工作的成功取决于它选择对各国具有真正实用价值的专题，或者各国本身并不强烈反对的专题——它们愿意为此付诸后续行动，例如以公约的形式。委员会自 1947 年成立以来，完成了与国际法经典分支相对应的大量专题的项目。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委员会工作方案中所包含的某些专题的效用令人怀疑，因为这些专题并未反映真正的需要，或需要高水平的专门技术知识，而这是第六委员会中代表团所不具备的。

第四个因素涉及对委员会——有时甚至是对国家——的诱惑，即摆脱公约草案，转而采用通常被称为“软法”的标准。然而，这种可以理解的趋势引起了对委员会工作和国际法性质的怀疑，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纯粹的学术产品，有时会加入意识形态或象征性的维度，当那些产品没有充分反映各国的期

望、愿望或实践时，自然不能引起它们的兴趣。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表示希望一个项目应作为制定公约的基础，这意味着最终产品必须具有足够的共识——六委与委员会之间的对话是确保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并且反映会员国的期望。

谈到改善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关系的一些想法时他说，首先，委员会应重新关注其核心任务，即一般国际法。实际上，期望委员会有效处理非常技术性或非专业化的专题是不切实际的。第二，委员会应进行一些实际改革，包括将其工作方案的主题数量限制在四至五个。这将使委员会能够更快地就每个专题取得进展，或者至少更深入地审议每个专题，并促进与各国的对话，而不会耗费它们审议委员会提案的能力。

第三，委员会应采取最普遍的方法，加强其理解世界不同区域实践和判例法的能力，并严格遵守其本身的工作语文规则制度。按照这一思路，使用至少两种工作语文只会提高委员会书面产出的质量，特别是在起草委员会的范围内。

第四，会员国应更明确地向委员会表达它们的期望，并就委员会工作方案拟议的专题提出建议，正如波兰最近在提到国际法中不承认非法情况的责任专题时所做的那样。有些国家在 2017 年提出了几个新的专题，希望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同样重要的是，各国也必须提出完全符合委员会《章程》规定要求的候选人，他们应是具有公认的国际法资质的人士。最后，会员国必须通过向委员会提供信息，并与委员会开展持续对话，例如与学术界合作，以支持委员会的工作，正如编纂司在编写关于使用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考察的方法和手段的备忘录(A/CN.4/710)时所做的那样。

最后，他希望，通过委员会和会员国的共同努力，双方将重新致力于开展强有力的建设性对话。第六委员会就委员会年度报告的辩论仍然是这种对话的高潮，它是在一个特殊论坛上开展的，特别是因为在纽约开会时有为数众多来自会员国首都的法律顾问。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委员会会议应继续在日内瓦举行，以便为其工作提供最佳条件。

哈穆德先生(国际法委员会)作为小组成员说，委员会成立七十周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委员会在发展各种领域的国际法，包括条约法、海洋法、外交和领事法、国际刑法和国家继承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的工作也有助于其他领域的国际立法进程。

在委员会成立和起草《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款时，已经通过实践确立了某些国际法领域，从而能够编纂相应的规则。然而，第十三条第一款和委员会《章程》的起草者们认为，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与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章程》第 15 条中，对每个术语作了单独的描述。《章程》的后续条款规定，大会、会员国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或政府间协定设立的官方机构，可以提交提案和多边公约供逐步发展，而委员会则开启调查，以期选择有待编纂的专题。

尽管如此，这一过程多年来已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委员会的项目既含有编纂也包含逐步发展。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两个职能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特别是就查明相关的实践，从而可能有助于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而言。这种情况，以及实践有时是混合和矛盾的，以及用于确定规则的声明在所涉规则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规则或新出现的规则方面并非一向十分明确，因而导致逐步发展与编纂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关于某些专题，委员会有时选择确定拟议的规则或结论是否构成逐步发展或是编纂。在进行评估时，它考虑了某些关键因素：其成员的观点——他们是具有各种法律背景的法学家；对条款草案的评注——其中涉及方法、推理、实践、先例和学说等方面；以及第六委员会表达的对国家和其他行为者对特定项目的反应，或对委员会编写的调查问卷的答复。

该评估中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委员会工作成果的形式。如果它包括适合以条约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形式通过的条款草案，划清编纂与逐步发展之间的界限则不那么重要。当结果属于一项研究时，其重点是法律的现状、实践状况、司法先例和学说，而不是确定哪些条款属于编纂，哪些属于逐步发展。

简而言之，委员会并没有采用任何单一的方法，而是采用各种要素的综合来确定逐步发展与编纂之间的划分是否相关。根据他的经验，对委员会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做出这样的区分，而是确保委员会的每一项产品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承认，并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具有法律价值和重要性。

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挑战之一是，尽管大会赋予了委员会此项任务，但它在确定、发展或提炼国际法规则方面并非发挥重要作用的唯一实体。其他实体包括国际法院和法庭、条约机构、国家法院和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此外，委员会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是一种咨询性质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解释性质的。

另一项挑战是，委员会在挑选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和在确定这些专题的结果的性质和内容时，需要考虑到某些技术领域的专门机构的工作。它过去这样做了，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法律和跨国法律各个领域的分支专业化仍然是一个挑战。委员会可以善用这些挑战，重点关注它能为发展和确定任何国际法领域的规则增加的价值，而不应过于分散精力从而损害其结果。

构想委员会应仅局限于一般国际法领域并未得到经验的证实。多年来，委员会在环境、人权和投资法等领域开启了专业议题。它的工作具有权威价值，并被法院和法庭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实践中引用。委员会在长期和短期工作方案中列入了一般国际法专题以及专门领域的专题。

另一个挑战是需要在选择与国际社会相关的专题时坚守主张与对其工作内容采取原则性法律立场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只涉及国家；它涉及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国家和国际法院、国际组织和其他专家机构，以及个人，他们是委员会工作的最终受益者。世界人民的福祉、安全、繁荣和发展可以通过遵守国际法得以实现，毫无疑问，委员会通过其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

菲尔森女士(伯利兹)作为小组成员说，她打算提出的许多要点已经由其他发言者提到了。她赞赏哈穆德先生描述的区分逐步发展与编纂的困难。这一点在审议委员会在日趋民主化的更广阔多边立法进程中

的作用时很重要。她还对阿拉布吕纳先生就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这些挑战的可能方法提出的意见表示赞赏。特别是在审查六委与委员会之间关系的结构性挑战时，各国的期望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六委向委员会提供指导，委员会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工作，以确保其产品的合法性。关于逐步发展与编纂之间区别的讨论以及一些政府代表对两者合二为一所持的保留态度表明了这一点，理由是这种区分与各国如何就委员会对特定项目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有关。委员会有必要关注各国的利益，以确保它对上述利益作出回应。委员会是否在特定范围内这样做，取决于六委与委员会沟通的情况。

由于不希望把委员会委员当成立法者，因此各方对于将重点放在逐步发展上似乎犹豫不定。因此，倾向于使委员会委员更接近编纂者的构想。但是，必须承认国际法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方面，那就是委员会的工作涉及广泛的行为者，包括国家、仲裁庭、个人、律师和非执业者。

虽然委员会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但这一重点需要扩大到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委员会在表示愿意考虑整个国际社会感兴趣的专题时，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她非常感谢能有机会就委员会审议中的专题与其互动。虽然她同意委员会已经审议的国际法一般原则对于各国在更广泛的全球社会中的互动方式非常重要，但面对非国家实体在国际法领域日益增长的作用，国家也面临新的生存挑战。

正如各位发言者在上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国际法发展的前景非常复杂，多边主义、单边做法的盛行，以及必须面对的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的威胁也带来了挑战。此外，像她的国家那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永久性损失和破坏的前景，气候变化将彻底改变其领土的完整性。委员会致力于满足各国期望的部分承诺使它有能力和解决各国的一些紧迫问题。因此，有必要超越六委与委员会运作的双行道，并在决定如何解决发展国际法构成的一些挑战时，考虑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要求和紧迫问题。

彼得里奇先生(国际法委员会)作为小组成员说,虽然在上次会议上所作的纪念发言说明了委员会的重要性及其骄人的成就,但委员会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他希望谈谈其中的一些挑战。

在委员会成立之时,人类刚刚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联合国刚刚建立,人们强烈期望世界同心协力努力确保集体安全和尊重法治。在这一背景下,委员会受到了极大的尊敬,人们对其成功寄予厚望。在国际法的基本领域需要编纂法规,例如外交、条约和海事关系,当时所有这些都受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约束。在委员会成立的最初 40 年中,它帮助各国编纂和逐步发展当代国际法的支柱,包括但不限于条约法、外交法、领事法、海洋法和国家继承法。

然而,委员会目前并非没有问题。一些人批评它的构成,并声称在第六委员会中代表其政府的委员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不能充分独立。他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他曾为本国外交部工作,并且十多年来一直是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未对委员会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他也不同意不是独立学者的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独立的委员会委员的说法。

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总的涉及与会员国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涉及专题的选择,各国在委员会审议专题期间所能做的贡献,以及就委员会的最终产品所能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在过去 20 年中,曾有多次注意到委员会的提案,但随后将它们束之高阁,而没有对这些提案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外,国家积极参与关于委员会未来工作的讨论次数极少,各国对委员会工作的反应通常,但并非总是数量有限。

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存在合作气氛。委员会经常主要是在其工作方法工作组中讨论如何改进这种合作的问题。委员会决定在纽约总部举行第七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是朝着推动这两个机构朝着更多合作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他希望,由于这一步骤,各国将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更多贡献,并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委员会的最终产品,而不论它提交的形式如何。

在谈到委员会为工作方案选定专题时,他指出,作为一名律师,他一直认为法律服务于弱者,因为强者并不需要法律。这项一般规则适用于国家关系,也

适用于国际关系。他认为,小国尤其应当利用国际法来实现它们的目标,并应在形成国际法时积极参与。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的经验并非如此,因为它很少从西方国家以外的国家收到对其工作的评论。已要求委员会审议小岛屿国家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希望委员会有足够的勇气从事这项工作。

关于委员会未来的专题是一般性的还是具体的,可以考虑的一些一般性专题是:国际法主体和国际法渊源,如一般法律原则。然而,展望更远的未来,他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特定专题即将呈现。这是因为国际生活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在许多领域进行监管,包括环境、通信、信息和外国投资等等。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委员会按照目前的构成难以处理这些具体而又非常紧迫的问题。绝对有必要探索将技术、科学和专业知识纳入委员会工作的新方法。也许,委员会可以考虑与会员国一道,在未来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一些改变。

另一个问题涉及被视为是他称之为“政治污染”但其法律层面仍需要解决的专题。其中包括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对土著居民的保护、保护的责任和自决权。他怀疑潜在的自决要求为数众多。倘若委员会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恰当机构,那么问题是哪个是恰当的机构。还产生了一些问题,即这些决定是否应仅由国家临时按个案自行决定,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需要一些技术投入。

关于与人权有关的专题,委员会不应当以矜持态度对待将它们列入工作方案。他感到自豪的是,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关于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专题的工作,特别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独条款列入了一个提及人的尊严的项目——这是许多其他文件中应当却没有列入的项目。

谈到委员会对话伙伴的问题,他指出,委员会是一个服务和协助各国编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的机构。其对话伙伴借助六委是会员国。在这方面,委员会取得了成功而且富有成效。然而,鉴于其积累的知识和智慧及其新型产品,例如,可以采用结论、指导方针或原则的形式,委员会实际上面对的是更广大的受众,包括所有相信法治的人,而法治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未来。

在这方面,他希望确认秘书处对委员会工作的巨大贡献以及每年在委员会届会期间举办的国际法讲

习班的贡献。其重要性在于这是委员会与更广大的受众，特别是致力于国际法的年轻人对话的方式之一。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共同主席)作为主持人发言，邀请与会者向小组成员提问。

特拉迪先生(国际法委员会)说，由于这些发言往往只关注委员会，他想知道小组成员是否可以考虑讨论第六委员会如何改进其工作方法。例如，彼得里奇先生指出了一些问题，譬如六委在挑择专题方面可发挥的作用，而事实上它通常没有发挥这一作用。还有一个问题是委员会的最终产品提交大会后对它采取的行动，六委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造成拖延的因素，其中可能包括工作方法、采用的决策过程或对形成共识的要求。他想知道是否需要达成共识，至少在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否妨碍了它们的合作，或者使六委难以同意审议委员会的许多提案，例如谈判一项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公约的提案。

瓦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共同主席)作为主持人发言说，特拉迪先生提出的观点似乎更多地属于第二小组讨论的范围，因为这些观点涉及为加强六委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可采取的实际措施。

加福尔先生(共同主席)说，第六委员会的一个独到之处是它始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就六委的审议而言，他本人一直倡导达成共识，因为共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六委第七十二届会议期间还就委员会对某些事项进行前所未有的表决以及这是否有益进行了一番辩论。曾经有人试图就六委的某些专题付诸表决，但六委尽力避免这样做。因此，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持续问题，他对这方面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

他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委员会与六委之间的沟通，以解决六委对委员会的最终产品应采取的行动。六委的年度会议为此类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但需要加强。它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每年应予以充分利用，必须探讨如何加强纽约会员国代表与日内瓦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沟通。关于六委工作方法的改革，他对委员会委员也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因为最终这些方法旨在建立共识，并找到六委可以接受且能为会员国增加价值的结果。

格罗斯曼·吉洛夫先生(国际法委员会)说，虽然确实有可以区分把某项条款定为逐步发展或将它定为编纂的情况，但要做出这种区分并非一向容易，因为，在进行较细化的分析时，条款是否反映了逐步发展还是编纂，通常会出现概念问题和分歧。在这方面，无论是在法律传统中，还是在外交传统中，某些问题留待解决并非前所未闻。当然，委员会应希望尽可能清晰明了，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含混之处，而且对它们需要有灵活性。例如，在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讨论中，许多委员认为这种人格得到习惯国际法的承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得到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给概念贴标签，而是为讨论和发展法律留出空间。这不仅适用于委员会的工作，也适用于各国的评论。在他看来，该原则是关于条款规范价值的法理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他来说很明显，一项条款是否表达了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问题并非是二元的。实际上，提交国际法院的许多案例涉及关于某一特定规则的内容是否构成习惯国际法的同一讨论。这表明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皮克尔女士(德国)说，在第六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上已讨论过委员会的两项任务。六委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国家实践支持其论点，委员会不应将其工作描述为编纂现有的习惯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两个不同方面必须保持绝对分开，一种明确区分，它必须反映在委员会工作的最终产品中。每当提出新的国际法规则时，应采用的方法是提出条约草案，而非仅仅是制定条款草案，由国家法院或其他方面直接用于确定现行国际法。

国际法委员会是国际法领域最受尊重和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做出决定时无可挑剔的认真仔细和所遵循的高标准。它的作用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同，后者可以参与倡导和论证，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委员会是联合国会员国设立的一个联合国机构。它得到各国的授权，其成员由各国选举产生。其工作通常由国家法院直接纳入考虑，在确定特定问题的现行国际法状况时，也由行政和立法部门直接审议。这涉及委员会编纂现行国际法任务的部分内容。毫无疑问，委员会的授权任务还延伸至逐步发展有待各国采用的国际法提出建议。然而，当委员会混

淆其任务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界线时，其合法性的基础便受到质疑。创立国际法的是国家而不是委员会；因此，国际法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必须由各国通过条约达成一致。

萨博亚先生(国际法委员会)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委员会已有七十年的历史，它也必须继续改变。为此，它已不断地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正如佩特里奇先生所表明的那样，委员会有必要在传统专题与那些应对周围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的需求的专题之间保持平衡。

在委员会最富有成效的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哈穆德先生描述了使用力学工具处理国际法的困难。委员会的委员既不是机械师，也不是工程师。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是精妙，还有技术知识和对法律各个方面的评估。委员会前委员麦克雷先生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他说，如果委员会打破这种行事方式，如果它采取僵硬和机械做法，就会陷入瘫痪状态，无法以创造性方式前进。

重要的是要铭记，委员会是一个专家小组。固然，委员是由各国选举产生的，但只要他们是委员会委员，他们就是独立专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对各国的观点和需求熟视无睹；相反，明确了解各国的观点非常重要。事实上，经常要求委员会提供更多这类资料。但它需要保持其独立判断，不应受到逐步发展相对于编纂的机械观点的束缚，或者受它应该采用何种决策过程的概念的束缚。虽然第六委员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但委员会有时在起草委员会或全体会议上采用象征性表决方式。

第二小组讨论：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对以往和未来互动的反思

加福尔先生(共同主席)以主持人身份发言，请小组成员讨论一个关键问题，该问题无疑萦绕在会议许多与会者的心头，即两个机构在七十年合作的背景下，并且与七十年前相比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两个机构所处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形势也是新的，第六委员会和委员会如何能够采取不同的和更好的做法。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作为小组成员说，他最近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是一项殊荣，但起初他获邀作为俄罗斯联邦法律顾问参加小组的讨论，他以这一身份发言。

虽然委员会正在庆祝其成立七十周年，但编纂国际法的想法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尽管时间流逝，但目标始终保持不变：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并防止战争和冲突。在以往曾为委员会工作做出贡献的众多国际法学家中，他只想列举几位来自其本国的法学家：弗拉基米尔·克利茨基先生、格里戈里·通金先生、尼古拉·乌沙科夫先生和他的前任，罗曼·科洛德金先生——身为前任特别报告员，他编写了三份关于“国家官员免受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报告。若没有秘书处的专业水准和奉献精神，委员会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虽然委员会是大会的附属机构，但它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而第六委员会的政治指导使委员会能够深入了解各国的需要和期望。

委员会早期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为长期工作方案设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委员会编写的案文构成了一些重要国际文书的基础。委员会在最初几十年的工作中，开展了对国际法中最具有挑战性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的研究，结果在以后的几年里，在其工作基础上通过的国际文书的数量大幅度减少。

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对委员会工作需求的减少。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一些重要专题。它制定长期工作方案现在更加重要，这对于其工作是否受到各国的积极认可极为重要，进而导致起草国际文书。正是在这方面，必须在各国的要求与委员会的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

自 1992 年以来，采用了编制潜在专题概要和摘要的程序。根据《章程》第 16 条和第 17 条，委员会可审议大会、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主要机构提交的关于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提案。虽然早年它收到了大会的许多建议和任务，但近年来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可能值得就如何改进专题的确定和就它们开展工作的现有程序举行一次专门

的讨论。一种选择办法是建立一套由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批准和认可专题的制度。

前委员会委员伊戈尔·卢卡舒克先生曾经说过，委员会受其早期成功的拖累：已经从国际法主流领域的编纂工作转向处理更复杂却并非核心的问题。尽管如此，委员会近年来起草的许多案文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的责任和外交保护问题等案文呈现在脑海中。

这些案文要么仍等待第六委员会采取行动，要么不再由它审议，这不是因为委员会的缘故，而是六委的缘故，换句话说，是国家出于某种原因不赞成某一特定领域的某一公约。然而，即使是一些尚未得到国家“赐福”的委员会案文，也由法院作为习惯法的一部分使用。甚至连委员会尚未最后定稿的案文也被引用。

有人认为，委员会编写的案文质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各国的投入只能使它走样。他不同意这一做法。另一方面，如果各国无法就某一专题达成一致意见，则不能认为有关该专题的工作已经完成。早先在讨论期间已提出过六委决定以协商一致方式开展工作的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第六委员会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忠实于协商一致原则的联合国机构之一，其功不可没。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委员会本身无法达成共识，六委的意见一致就很难实现。

关于委员会的工作节奏，他说有时候慢慢加速会更好。委员会许多最成功的项目花费了数年才最终完成。并非所有政府都有能力对委员会的案文迅速作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意见就不重要。延长对某一专题的讨论通常可以收集更多的意见并得到妥善的解决。

另一个实际问题涉及特别报告员的酬金，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编写报告。自 2002 年以来，当时大会未与委员会协商即通过第 56/272 号决议，规定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任何报酬仅限于每年 1 美元。俄罗斯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支持委员会努力说服大会审查此事，并希望就这一问题持续开展的对话会产生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要人类努力追求各个领域的进步，只要人们始

终力求建立更好和更和谐的关系，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工作仍将为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好处。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国际法委员会)作为小组成员说，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之间的建设性有效关系是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妥善履行其授权的先决条件，即开展研究，提出建议，以鼓励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随着多年来委员会与六委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这两个机构的不同性质和职能已日趋彰显。虽然六委是履行大会任务的主要论坛，但委员会是一个附属机构，负责从技术和司法角度开展研究和制订项目。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使用了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第一种方法是选择专题。虽然《章程》允许各国向委员会提出专题建议，但此种情况最近很少发生。因此，专题的选择变成由委员会做主，各国没有参与该进程似乎导致各国最感兴趣的专题与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中所涉及的专题彼此相脱节。这反过来又使各国对委员会的工作失去了兴趣。

委员会传递有关其工作的信息的方式对于它与六委的顺利互动至关重要。现在主要是通过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及其会议的简要记录来传递。所缺少的是向第六委员会快速提供有关委员会正在做什么的信息的方法。也缺乏直接渠道，无法使特别报告员向第六委员会通报他们的工作。

然而，委员会还须得到各国的投入。最近这些都在减少，收到的反馈明显缺乏地域代表性。可能会对这一现象作出许多解释，但最重要的是许多国家拥有的国际服务实体规模很小，因而面临实际困难。此外，尤其是在一读审议若干案文的时候，委员会向各国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使各国难以提供对委员会开展工作至关重要的所有信息。

在过去几年中，第六委员会开始批评委员会在某些专题上，如果有进展的话，取得进展很缓慢。这种批评引发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委员会与六委如何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因此，她希望提出一种方法，使委员会与六委之间的信息流动更迅速有效，促进一种更为可行和活跃的对话。

首先，委员会可以在其网站上营造一个协作空间。该网站近年来经历了巨大的改进，但其结构仍然是作

为信息来源，而不是对话。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这些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没有什么妨碍将一个只有会员国、委员会委员和秘书处才能访问的空间纳入网站。它将有助于以直接和灵活的形式提供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信息和反应，加快各国与委员会之间的沟通，而不仅仅是在大会届会期间。它还将促进没有能力编写正式评论的国家的参与，它们可以非正规方式向委员会提供信息。

其次，六委中的代表团一再要求委员会在纽约举行会议。根据目前的经验，显然不会导致法律顾问更多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大会期间召开正式会议，专门讨论委员会议程中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或已出现争议的某些特定专题，而不是象目前这样的会外活动，可能有助于改善委员会与六委之间的合作。

奥尔纳先生(秘鲁)作为小组成员说，各位发言者经常提到“合作”和“对话”。它们是委员会与六委之间关系畅通无阻的关键。但是，必须牢记这两个实体作用之间的区别。分配给委员会的是技术职能，而第六委员会中政府代表的作用是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政治指导。委员会对国际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六委的对话进行的如何。

今天很多人都提到对委员会的工作缺乏回应，以及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在他看来，这并不就表明各国缺乏兴趣。大会每年都对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作出反应，并就审议符合各国优先事项的专题提出具体要求。

一般来说，应当鼓励这种提出具体要求的做法。然而，第六委员会有时也选择设立委员会以外的其他附属机构，例如特设委员会。还有常设委员会，例如《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工作组和闭会期间小组，六委寻求通过这些机构加强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全年组织的会外活动，特别是在大会期间举办的会外活动，同样有助于促进对话。

关于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如何相互影响，他说，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也担任六委的代表。这两个机构的共同成就包括 1958 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其中载有关于海洋限制的规定，这些规定后来被纳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也有互动不太成功的案例。例如，委员会在 1990 年即完成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

但大会到 2004 年才通过了该公约——六委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工间休息”了 14 年。这种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六委倾向于仅仅注意到委员会的产品，而不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如前所述，在 14 年中委员会编写的任何案文本来都可以在一次政府间会议上通过。人们希望，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最近已有一些迹象表明，这是有可能的。另一个危险是六委如出一辙再现委员会的讨论，而六委的辩论本应该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

可采取若干实际措施改善六委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第六委员会不应仅仅认可有待委员会审议的专题，其本身也须提出这些专题建议。六委应更明确地界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在适当的指导下，委员会将能够相对迅速地取得成果。可设想在大会每届会议开始时由委员会主席与第六委员会主席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需要六委采取行动的领域。在六委中，不仅应该增加国家与委员会之间的对话，而且还应该增加与学术界代表的对话。委员会可以作出决定每五年在纽约举行届会的一期会议，并适当考虑到《章程》第 12 条。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如司法或环境部门的投入应纳入各国在六委就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评论和意见中。

展望未来，他希望委员会保留其目前对国际法的全球视野，同时与专业论坛并存，并在更专业的领域开展工作。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女委员。委员会应继续修订其工作方法，包括会议的次数和决策程序。它应该成为真正的多语种，在拟定产品的各个阶段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工作。它应该执行其长期工作方案，并确保其中包含符合会员国需要的专题。

最后，他说，只要国际社会继续发展，尽管多边主义受到威胁而且法律日益复杂，但委员会的工作仍将是在严格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实现世界秩序努力的核心。

哈苏纳先生(国际法委员会)作为小组成员说，作为第六委员会的前任代表和委员会目前的委员，他对这两个机构之间的互动问题尤为关心。委员会与六委的关系是其工作的核心。事实上委员会成功地对国际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归功于它与六委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既有被动一面，也有主动一面，但始终牢固地建立在相互作用和沟通的基础之上。

除了委员会每年向六委提交年度报告外，在大会期间特别报告员还与六委中感兴趣的成员进行互动对话。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委员会委员提供非正式通报。委员会目前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也旨在促进六委成员与委员会委员之间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经验，可能有助于在纽约举行更多的会议，至少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纽约举行的本届会议，使委员会委员有机会在几乎每天排定的众多会外活动中，解释他们对各种专题的看法。在会议期间，就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法方面的作用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其间与会者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委员会的成就。

委员会在与六委的关系中通常都是自主的，大会已经认识到，委员会不应受任何一个机构的详细指示的约束。委员会在其努力使国际法更清晰明确和更容易推行方面仰赖第六委员会和大会提供指导和信息。委员会和六委对国际法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原因之一是这两个机构的组成有别。委员会由独立专家组成，他们在讨论中避开政治。虽然他们通常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工作，但在极具争议的问题上，有时会诉诸表决。他们的独立性滋养了公正性和客观性，尽管他们的法律背景和国家经验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第六委员会由政府代表组成，他们为讨论带来了政治背景和观点，并充当政府利益的代言人。遗憾的是，委员会委员的遴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候选人的资质。

当然，需要委员会委员的客观角度和政府代表的主观角度，以便将全部国际实践纳入编纂工作，确保它有针对性，为各国所需要。如果这两个机构缺乏合作，委员会的工作将有可能流于学术化和变得无关紧要，而第六委员会可能会失去对国际法前沿问题的专门知识。

委员会谋求加强与六委关系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其主持的工作组对其工作方法的目前审查。目前与第六委员会互动中取得的经验无疑将丰富工作组即将在委员会届会第二期会议时进行的讨论。但是，他希望第六委员会对其工作方法也进行类似的审查，以便更多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越来越多地拟定原则、准则、结论和研究组报告，而不是条约或公约的条款草案，这是对各国

减少通过条约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义务给与支持的一种反应。委员会的期望与各国的期望似乎存在脱节。尽管委员会有一些最成功的项目，包括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和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但第六委员会仍在不断推迟审议其最后形式。虽然六委没有解释关于委员会产出最后形式的决定，但它有时提到各国对某些内容犹豫不决，并要求各国政府提出进一步评论，就像预防跨界含水层和外交保护这类专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与六委之间必须进行更好的沟通。防止委员会的产品被六委束之高阁的一项建议是，各国在整个审议过程中，通过评论提出对专题最终结果的选择偏好。另一个想法是大会和第六委员会向委员会建议供编纂的专题，从而确保这些专题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该程序已成功用于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在对其议程上的专题进行分析时，委员会一向通过各国的书面评论和在六委上的发言来审议各国的意见。然而，提交书面评论的国家数量一直有限；特别是代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观点不足。若要世界所有地区都需对国际法的形成发表意见，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可能在于鼓励各国参与联合国的区域程序和区域组织。例如，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其成员就委员会议程上的各项专题提出意见。

人们有时说，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它现正在国际法不成体系之时面临身份危机。人们普遍认为，委员会可能并非处理国际法新兴技术领域的适当机构。实际上，专门机构的扩散和对某些国际法领域的编纂，例如外层空间和经济关系，缩小了委员会的工作范畴。他认为，委员会应与有关领域的科学家和专家以及专门国际机构合作，继续探索国际法的专门领域，由“保护大气层”专题特别报告员组织，2017年5月4日由委员会与科学家以对话形式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就是例证，会上科学家向委员会解释了与保护大气层法有关的一些科学上的细微差别。

虽然一些评论者将委员会的未来描述为不确定，但其机构知识以及与第六委员会的伙伴关系使它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继续编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当各国未能就国际法的发展达成一致时，委员会实际上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承担了更重要的责任。它始终作出调整，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现在，由于它涉足的国际法领域不像七十年前所处理的专题那样有把握，因此它必须继续适应如何在履行任务的同时，满足所有国家的需要。

李永胜先生(中国)说，值此第七十届会议之际，他愿向国际法委员会表示热烈祝贺。在过去七十年中，委员会及其委员们为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高兴地注意到，最初当选为委员会委员的两位女性来自中国和葡萄牙。

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与各国合作制定国际成文法，以促进国际法的确定性和普遍遵守。如何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促进委员会的产出转变为成文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有若干机构和机制参与国际立法进程。如果无法有效加强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在国际立法工作中的传统优势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他提出几点建议。

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可以共同确定国际社会在国际法方面的优先事项，并确定委员会的工作方向，以满足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专项国际法专题的需要。第六委员会应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指导，并予以更积极的回应。它应该探讨是否有可能就委员会已经完成的条款草案或委员会可供编纂的一些成果制定国际公约。应加强参与国际立法进程的联合国机构和机制之间的协调，并应减少国际法的多样性和分散性。最后，应促进更广泛地传播委员会工作的成果。

加福尔先生(共同主席)，作为主持人发言并总结

了讨论，他说，讨论的内容丰富详细，可以作进一步反思。他感谢小组成员的发言以及就如何改善六委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提出的许多建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两个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它们各自的成功至关重要。鉴于多边主义的整个背景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伙伴关系的每一方都需要反思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七十年来，委员会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不是相反。同样，第六委员会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他对未来两个机构的作用并不悲观，但它们必须抓住机遇，适应当前的环境。

委员会与六委之间需要相互尊重。显然，委员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它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工作方法。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两个机构不应各行其是，互不沟通。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很重要，但并非一切。与各国代表，特别是与欠缺人力和财力资源的代表进行交流，提高认识和增强对其工作的认知这一过程本身也同样重要。

闭幕致辞

加福尔先生(共同主席)特别感谢委员会主席与他一道主持互动讨论，并对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将有益于联合国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感到乐观。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共同主席)说，他对共同主持人、小组成员和其他与会者表示赞赏，并强调所提出的许多相关问题的重要性，这些内容定会丰富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之间的对话。

下午 6 时 05 分散会。